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教育论析(1949~1952)^{*}

宋学勤 倪梦琪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与各级政府继承和发展根据地时期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农民与工人等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教育,以提高普罗大众的文化素质。在此过程中,中共与各级政府通过开展“文化诉苦”等活动,发动社会力量自发解决教学困难,定期组织民众进行集体学习,增强了普通民众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认同。这为普通民众适应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向集体化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社会教育; 文化诉苦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19)02-0090-06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教育主要是由中共领导,针对工人、农民开展的扫盲识字工作,包括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其对中共和新生政权的认同而进行的文化普及活动^①。中共早在根据地时期就较为注重社会教育,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教育的形式不断成熟,这不但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质,也带给长期处于家庭或宗族本位、缺乏“集体意识”^②的中国基层社会前所未有的集体生活和集体观念。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地方研究的视角,探讨扫盲对生产生活、动员群众、政治意识形塑等方面的作用^③。实际上,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中共与各级政府在开展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开展“文化诉苦”、发动社会力量自发解决教学困难、定期组织民众进行集体学习等实践活动,为普通民众适应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向集体化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一、“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涣散的社会状态,中共党人并不陌生,特别是毛泽东,早在1920年他便直言“说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④而中共成立以后所做的就是改变民众的“一袋马铃薯”状态,将民众力量凝聚起来,而发动了社会革命^⑤。1938年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65)”(项目批准号:16JDKDB010)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社会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8XNH067)阶段性成果。

① 学界大多将“社会教育”概念界定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本文讨论的社会教育,特指中共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具体实施的,采取农村农学、民校、职工业余学校等形式的工农教育。

② 本文讨论的“集体”区别于一般的人员集合,特指中共领导下以地域、生产为主要联系的群众集合,“集体意识”指群众对这种集体的感知、认同和参与其中的意愿。

③ 参见杨丽萍《1949—1952年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岳谦厚、杜清娥《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吴敏先、方海兴《论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等。

④ 《反对统一》,《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页。

⑤ 宋学勤《“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3期。

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他认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这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群众的无组织状态”^①,这种“无组织状态”不仅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经济组织的程度,更指普通民众思想上的松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共能够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共有效地动员了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组织基层群众参与社会建设是中共面对的十分紧要的问题。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建立国家与基层社会有效的连接,就要尽快打破以血缘、地缘等要素作为联系纽带的传统基层社会关系,整合旧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的状态”,要将中国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②。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增产节约等运动,将社会成员广泛地组织到各类新型的社会组织中来——在乡村建立农会、民兵组织、青年团、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在城市建立居委会,创立单位体制。将社会成员组织化,是中共建设新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发动运动是一种较为快速剧烈地促成社会成员组织化的方式,而长期稳定开展的社会教育也对推进基层群众的组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领导的社会教育曾在动员根据地人民参与抗战、普及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全国而言,文盲情况仍然严峻,同时学校教育尚未健全。有统计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总人口大约5.5亿,其中80%以上为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③。这显然成为人民当家作主和建设新国家的巨大障碍。而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把“从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扫除文盲”作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④。中共以往开展民众扫盲识字工作的成功经验加之新中国各项建设的迫切需要,社会教育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最便于开展的工农教育方式。在中共的领导下,社会教育很快走上正轨。自1949年9月至1950年9月的一年间,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到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设立社会教育司、识字运动委员会,再到在农村开展冬学工作和对城市职工进行业余教育,中共领导的社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社会教育的开展需要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从“动员群众”到“群众自发参与”,这个互动的过程增强了群众的集体认同感,为群众“走进集体”奏响了前奏。社会教育的开展初期,许多人尚未认识到学习文化的必要性,农民对识字工作的关注度比较低,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冬满堂,春一半,一到夏天不见面”^⑤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普遍存在师资、经费紧缺等问题。在中共的领导下,各地由党政干部带头开展“文化诉苦”,动员群众自发解决师资、经费等教学困难,为集体学习做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工作。这个过程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更多集体生活的机会,“文化诉苦”促进他们产生情感共鸣,“合作解决困难”可以促进他们的群众集体意识的形成。

二、“识字”:一种象征着“翻身”的新仪式

新中国的社会教育开展之初,不少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学习文化,甚至还存在思想顾虑,例如认为“年纪大了,学不好”,“人过三十不学艺”^⑥。为了使普通民众认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各地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②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0页。

③ 参见[日]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王国勋、刘岳斌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④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⑤ 《北京市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先进单位代表参会参政材料〈黑龙江省农民业余教育的新形势新任务〉》,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以下简称京档),档案号:152-001-0058。

⑥ 李彬、董力发、郭永太《山西榆次六堡村四百农民开始常年文化学习》,《人民日报》1950年3月24日,第3版。

采取多种方式动员群众学习,如“劝学、挖糊涂、文化诉苦、组织小学生演宣传剧等多种多样的方式”^①。其中,“文化诉苦”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文化诉苦”在“诉苦”运动的背景下展开。“诉苦”运动就是工农群众自己“倒苦水”、“挖苦根、找苦源”,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和周围其他的穷苦人民一样,都在旧社会经历过相似的苦难,再进一步“挖甜根”,感受到中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新生活和新希望。“文化诉苦”则专门针对“不识字”带来的剥削和苦难,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让他们有学习积极性,主动接受社会教育。在文化诉苦中,许多农民倾吐了长期在封建压迫之下不能受到教育而遗留至今的苦楚。如旅大识字学校码头第五分校一位60岁的老工友诉说:“‘八一五’前,我由山东来到大连,借住在同乡家,靠卖鱼维持生活。有一次到棒槌岛去挑鱼,因为路不熟,走入了日本人的军事要塞地里。那里虽然有个牌写着‘军事重地,禁止通行’,但我不知道它上面写的什么。结果被宪兵抓去,罚跪挨打,险些送了命,好不容易才放了出来。”^②再如另一位工友李树风说:“过去由于不识字,找个人也找不着,东看看西看看,被警察当成小偷,抓去打得头破血流。通过诉苦会,工友们体会到了不识字的痛苦,并回忆起解放前捞不着学习的贫苦生活,阶级觉悟也提高了。此后文盲们下决心要学识字,有文化的工友们,也下决心帮助文盲学习。”^③“文化诉苦”让工农群众认识到不识字带来的不公,看到更多相同经历的人们因为不识字而在旧社会被压迫和欺凌,“识字”给受教育者带来一种朴素的文化想像,它让工农群众的自我人格得到了确认,促进他们产生主动学习的意愿,也愿意向集体靠拢。

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的“翻身”,对“文化翻身”提出了要求,是这一时期群众要求学习文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一些出身工农的基层干部,由于不识字而无法阅读文件,也是最直接的、来自现实生活的“苦”。1950年初,在山西省榆次县六堡村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村支部书记李铁锁带头“诉苦”:“当干部不识字真是苦。到区开会,人家是凭字记,咱是凭心里记”、“区里来个通知,填个表,开个收条都得要到处找人弄;还怕别人弄错了,自己负责”。青年团支部书记李二娃说:“提起不识字就想哭!在年关时闹宣传演剧,人家都会念台词,学得快;咱不行。咱又怕领导不好工作,直发愁。”^④学习了文化之后,很多干部打破了原来感觉没文化“吃不开”的思想包袱,参与学习的干部学员“尽皆欢天喜地,生气勃勃,打破了工农干部感觉没有文化就难以进步不能应付复杂工作的苦闷,深感自己的前途获得了光明”^⑤。只有识字、有文化,他们才可能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对人民群众来说,“文化翻身”成了“政治翻身”的一种“保障”。

开展“文化诉苦”之后,工农群众的学习热情被调动起来。“劳动”和“学习”成了新社会的一种精神象征,“识字”成为了一种带有情感要求的行为,识字带来的满足感也不仅仅停留在获得知识这件事本身,文化学习是农民们确认自身当家做主地位的象征,甚至成为一种象征着“翻身”的新仪式。1950年初山西省榆次县六堡村开过“诉苦大会”后,村里妇女赵俊林就表示:“我觉得识字比什么都高兴。我是坐着做活都带着书本,有空就学,见识字的人就问。只要用心,就能学会。”^⑥为了让大家都能有时间参加学习,村民们采取“男人在黑夜上课,妇女中午上课”的方式,热情很高。北京市在1951年扫除了11000余名文盲,扫除文盲的总数是过去3年的几倍。北京市东郊区大黄庄等29个乡,前3年在民校毕业的只有184人,这一年即扫除了1100多人^⑦。此外冬学、民校在推动生

① 许行《龙江县发达村的冬学》,《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第3版。

② 《一个工人识字学校》,《人民日报》1950年2月12日,第3版。

③ 《一个工人识字学校》,《人民日报》1950年2月12日,第3版。

④ 李彬、董力发、郭永太《山西榆次六堡村四百农民开始常年文化学习》,《人民日报》1950年3月24日,第3版。

⑤ 《北京市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初步总结》,京档153-001-0053。

⑥ 李彬、董力发、郭永太《山西榆次六堡村四百农民开始常年文化学习》,《人民日报》1950年3月24日,第3版。

⑦ 何祥生等《北京市几年来郊区农民识字学习的基本总结》,何祥生、陈光藻、刘崇兴、马宣、郭东文编《北京市成人教育史志资料》第1辑,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产和各项中心工作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1951、1952两年春天,北京郊区抗早点种,很多民校学员自动组成了抗旱大队,“三天就点了十七亩玉米、五亩白菜”^①。在带头参加互助组,贯彻婚姻法、优抚、卫生等工作上,民校、识字班学员也积极带头。在黑龙江省龙江县发达村,当年秋收打场将要结束的时候,青年们就嚷嚷开了:“打完场办冬学呵!”^②群众对社会教育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主动地表达集体学习的意愿,这使得村民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乡村社会更加具有集体性。

三、“以民教民”:从“动员群众”到“群众自发参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经济仍处于恢复状态中,师资、经费等是社会教育的主要难题。社会教育经费除了少量政府拨款,主要依靠发动群众自筹。群众的力量给社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根据东北地区情况,提出“训练教员的费用,在总的教育经费中开支,灯油、粉笔等费用开支则由群众解决”^③。北京市各地区的冬学工作经费,在由政府统筹部分开支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农民自发想办法解决。“十二区小屯村冬学学员自己动手,大家出料盖了两间冬学教室,解决了教室问题”,“很多村冬学学员给冬学教师糊窗户,打隔断,砌砖台,还有的自己出钱打煤油,多做副业,挣了钱来买识字课本”^④。群众教师的工资除了政府给予部分小米、煤等补助之外,大部分也是群众自筹,兼职教师主要来自农民、市民,这部分人的工作是社会服务性质,原则上没有补贴,除工作好而生活实在困难的,政府重点给予奖励补助,其余大部分教师都是完全的义务。

为了解决师资匮乏问题,中共与各级政府还提出了“以民教民”的方式。“冬学能否办好,决定的因素之一在于师资”^⑤,这一时期符合工农业余教育条件的正式教员数量远不能够满足社会教育的需要,1950年中共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大会上提出“师资问题,实行以民教民为主的方针”^⑥,教员主要由具备一定文化基础、民意基础或者政治身份的人来担任。“以民教民”既能缓解师资的紧缺问题,又能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教育的积极性。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以民教民”的方法,例如北京市第十三区提出“农村冬学是群众性的教育,因之冬学教员主要应从群众中解决”^⑦。教员选拔也有具体要求“现有民校教员及教过冬学的、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的、高小以上的程度在群众中有威望的,集中起来进行短期的训练,学习今年冬学的方针任务、生产政策及去年冬学的经验教训,然后分赴各村开展冬学。”^⑧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区里还定期开会培训,使他们有交流经验的机会。

教员来自工农,可以拉近群众与社会教育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来自于群众的教员“教生字注意联系农民的生活,使教了的字庄稼员能用上。教学时,针对农民记忆力较弱的特点,强调学员多

① 何祥生等《北京市几年来郊区农民识字学习的基本总结》,何祥生、陈光藻、刘崇兴、马宣、郭东文编《北京成人教育史志资料选辑》第1辑,第549页。

② 许行《龙江县发达村的冬学》,《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第3版。

③ 新华社《以部队机关工厂为重点,试行识字补习教育》,《人民日报》1950年3月25日,第3版。

④ 何祥生等《北京市郊区1950—1951年冬学工作初步总结》,何祥生、陈光藻、刘崇兴、马宣、郭东文编《北京市成人教育史志资料》第1辑,第547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年)》,内部出版1958年,第264页。

⑥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1950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2011年版,第374页。

⑦ 《北京市第十三区人民政府冬学办法与开办冬学教员训练班由1950》,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02-102-0025。

⑧ 《北京市第十三区人民政府冬学办法与开办冬学教员训练班由1950》,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02-102-0025。

写几遍。”教员还深入群众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学习中的问题,在教员的组织和帮助下,“各地冬学都注意了课外练习和课内复习,并创造了以小组为单位互相提问的办法,使学员学了的东西不会忘记,以提高并巩固学员的学习情绪。”^①对有思想波动的学员也便于沟通,提高学员对社会教育的亲切感^②。对于这种“以民教民,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针使群众容易认可身边选出的教员,彼此都更有动力投入教学活动,更容易建立崇尚文化的氛围,有利于社会教育的开展。教员选自群众、再回到群众中来教学,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四、“有重点地稳步前进,在巩固的基础上要求发展”

经过“文化诉苦”的动员,群众主动学习、主动为集体活动解决困难,社会教育有了走向常态化的基础。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教育在广大基层社会普遍开展,使之成为一项促进基层社会更有凝聚力的日常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分散在田间地头的识字牌、识字小组转变为固定的识字班、冬学甚至常年开办的民校,很多工厂成立了固定的读报组,工人和农民分别在企业和农村按原有知识水平被编入不同层次的班级按时上课,按计划培训、定期考核。班级这种组织集中高效,教师容易掌握,便于持续性的常年学习。社会教育的组织和形式由此逐渐固定化、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三年间,许多地区就已经办成了稳定、长期的工农业余教育场所。例如河北涉县在1950年底实现了“全区十九个行政村,村村有冬学”^③。北京市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更是率先完成了任务,1951年底郊区农村土改及农业生产超额完成增产一成的任务,农民的政治觉悟及经济生活均获得初步提高与安定,基本完成了“村村有冬学”的计划^④。同时各行业中的工人业余学校也很快建立起来,1950年底全市“职工工业余学校157个,其中由市人民政府业余教育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以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为主要对象,共51校,857班,30222人;一个单位独立办的,33个,工厂29,机关4,几个单位联合办的,2个,工厂联合按行政区由政府直接办的16个”^⑤。普通民众有了政治活动之外的组织化社会生活,而且频率更固定、与自身联系更多。

社会教育的常态化还表现在学习内容的计划性,这是社会教育稳定维持的一个重要保障,使群众切实地融入集体生活。1950年10月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上,中共对社会教育提出了“有重点地稳步前进,在巩固的基础上要求发展”^⑥的要求。各地根据农忙时间安排具体的学习计划,保证社会教育开展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并存。如北京市郊区根据农闲农忙时节进行的“分段速成”教学法,要求分别在第一年冬季(近200小时)、第二年春夏秋季(约100至150小时)、第二年冬季(巩固)完成识字任务^⑦。学习内容方面也有计划性,以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技术学习等。群众学习的课文,基本按照“基础识字——旧社会罪恶——工农翻身做主人”的逻辑顺序编排,从文化学习上升到政治觉悟。例如课文《旧社会》:“旧社会,真不好,天天做工吃不饱。做鞋的人光着脚,织布的人没有袄。旧社会,哪能不改造!”识字课文《工人作了主人翁》:“新

① 《辽西冬学结合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2月8日,第3期。

② 例如有“家庭妇女的学习情绪也不稳固,有的因与教员或同学有点小纠纷就集体的不来了,还得教员去挨户动员”,《成人夜校问题座谈会纪要》,京档152-001-0026。

③ 杨玉峰《涉县五区村村有冬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7日,第3版。

④ 《北京市郊区1950-1951年冬学工作初步总结》,京档152-001-0058。

⑤ 《北京市职工工业余教育工作初步总结》,京档153-001-0053。

⑥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1950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74页。

⑦ 《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报告》,京档011-002-00245。

社会大不同,黑夜过去太阳红;我们工人真光荣,个个翻身做了主人翁。做主人,责任重,业余学习不放松,文化好,技术通,手脑并用立大功!”^①这些内容宣传对工农群众在新社会中地位的肯定,加上移风易俗的新风尚和新习惯,借助歌谣式的课文,提高其接受度和欢迎度,随之增强群众对人民政府的拥护。反过来,群众接受教育后,又能促进社会风气的净化更新,形成个人和集体的良性互动。

社会教育还成为国家政策上传下达的媒介。积极的学员成了中共和人民政府的宣传员,成效较好的冬学成了乡村工作的火车头。在1953年北京市郊区的农民识字工作总结会上,一位乡干部说“有点什么事,民校一宣传,全乡都知道了!”^②北京市辛四村、南安河的村长说“有了冬学,工作好做多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冬学便是各村的宣传阵地。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大多数冬学学员首先带头,有的还排演真人真事的话剧在群众会上揭穿一贯道的罪恶。补征粮时,九间房冬学学员没等村里开好条子,就把粮食送来了,带动了全村。”^③可以说,中共通过开展社会教育,使广大群众有更多集体生活的体验,加深了对新政权和新身份的认知。工农真正感受到“翻身”,为开展其他政治运动和之后进行合作化运动等做了思想准备。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教育推进了文化普及的进程,也是一次培养工农群众集体认同的实践。列宁曾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④从前被隔绝在政治社会之外的农民们体会到自己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并有能力参与其中,一盘散沙的群众参与集体文化活动,从“政治翻身”走向“文化翻身”。正如群众经过学习后开始主动利用所学知识计算纳税、并主动上交农业税等行为一样,工人和农民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更加拥护中共和新政权,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中来。中共的社会教育工作契合“组织起来”的社会建设思想,让普通民众对“集体”有了更真实的感受和认同。可以说,贴近民众生活的社会教育是新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

(本文作者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江俊伟]

本 刊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知网及其电子期刊网站,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该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凡有不同意见者请特别声明。

本刊编辑部

① 徐勉一等《识字课本》第2册,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7页。

② 何祥生等《北京市几年来郊区农民识字学习的基本总结》,何祥生、陈光藻、刘崇兴、马宣、郭东文编《北京市成人教育史志资料》第1辑,第550页。

③ 何祥生等《北京市郊区1950-1951年冬学工作初步总结》,何祥生、陈光藻、刘崇兴、马宣、郭东文编《北京市成人教育史志资料》第1辑,第548页。

④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